

视点

第 3 期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2009年2月1日

ZHEN JIANG LIBRARY

本期 导 读

- ☆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干部存在四大问题
- ☆百姓日子就是政府形象
- ☆让干部专心谋事而不分心谋人
- ☆打击“山寨官员”应先管“正版官员”
- ☆辽宁阜新“大接访”活动的可贵实践
- ☆广吸人才增强文化产业“软实力”
- ☆镇江首届文化庙会圆满落幕
- ☆下一步改革路应迈向“新的开放”



镇江名人（十四）

卫生部部长、中科院院士、医学生物学家——陈竺，1953年生，江苏镇江人。1970年至江西插队。1975-1977年入江西上饶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1981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一部血液病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病研究室内科住院医师。1984年赴法国留学，1985年获法国巴黎国立医院外籍住院医师头衔，1989年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90年起历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研究员、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所长。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0年10月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院协作组织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6月任中国卫生部部长。他还在众多国内外学术组织任职。

陈竺在止血、血栓研究方面，尤其是在血友病和血管性假血友病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在国内首创根据血浆因子Ⅷ和因子Ⅺ水平进行血友病甲和乙的临床分型。对白血病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取得了系列重要发现：对T细胞受体伽玛链基因的结构和表达进行了创造性研究，发现了伽玛链基因可变区的整体多态性；在国际上首先建立了Ph染色体阳性白血病中BCR和ABL基因异常重组的工作模型，发现急性白血病中BCR基因的两个新的断裂点丛集区域(m-BCR1和m-BCR2)，为该类白血病提供了新的分子标志；发现PML-RAR α 和PLZF-RAR α 融合基因是APL的致病基因；发现中药砷剂能够诱导APL细胞的凋亡和部分分化，并发现这种作用可能与三氧化二砷下调凋亡抑制剂Bcl-2和APL特异的癌蛋白PML-RAR α 相关。这使我国在白血病的分化、凋亡理论和临床研究领域内保持国际领先地位。1993年以来，他又致力于人类基因组研究，参与主持了《中华民族基因组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他还致力于人类造血分化相关功能基因的克隆与结构、功能研究。

他在国际高水平学术刊物中发表论文55篇，其成就在国际学术界受到盛誉。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镇江首届文化庙会圆满落幕

在欢庆的锣鼓声中，嶂山马灯从蒋乔嶂山村跳到红豆广场；群星艺术团的阿姨们登上临时舞台演起《红楼梦》《梁祝》中的折子戏；从四面八方来“赶集”的我市民间艺术家们，摆弄着他们的绝活，蛋雕、剪纸、泥塑、烙铁画、绳结……热热闹闹，喜气洋洋。1月19日下午，我市首届文化庙会在红豆广场闭幕。

文化庙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主办，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红豆购物广场协办，是“这个冬天不太冷”系列活动之一。庙会在1月10日拉开帷幕，为期9天。除了民间手工技艺表演、民俗表演，还有民间手工艺品、民俗用品、南北年货、传统小吃展销，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观赏、购物。特别是开幕当天，精彩的舞龙舞狮、荡湖船、戏曲联唱、送春联等节目，让现场锣鼓喧天、人头攒动，掌声与喝彩声连成一片，热闹非凡。竹编、面塑、剪纸、中国结编织等民间艺术的现场表演，让市民流连忘返。

据悉，此次活动每日吸引群众近万人，在拉动消费的同时也极好地对我市民俗民间文化进行了宣传，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良好互动。

——摘自《人民网》

镇江数字化城管系统试运行

镇江市市级数字化城管系统试运行1月21日正式启动。

数字化城管系统按照“一个中心、两级平台、三种职能、四级管理网络”的组织架构，建立市、区两级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强化信息收集、指挥协调和监督考核三项职能，旨在完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城市管理网络，充分利用数字化城管平台，为“大城管”考核提供现代管理手段。

系统采取了“移动出资总集成、电信部门相配合”的建设模式，即：数字化城管建设项目由移动公司出资建设，并作为集成商，移动、电信有偿提供网络资源，建成后的系统平台由政府租赁使用。租金分五年按本金和3%的利率逐年支付，五年后整个系统归政府，系统平台建设、维护、升级、更新统一由移动公司负责，主要建设项目一律采用政府招投标方式实施。

——摘自《人民网》

镇江市价格诚信环境优化

经过近几年的价格诚信建设, 我市的价格诚信环境得到了明显优化, 价格部门“12358”热线受理的举报和咨询数量逐年下降。统计数字显示, 2008 年全市市县两级价格举报中心受理的价格咨询和举报仅 392 例, 较 2007 年度的 594 件下降了 34%, 较 2006 年度的 792 件下降了 50.5%; 立案查处的价格(收费)的违法案件 140 件, 较 2007 年度的 189 件下降了 25.9%。

立案查处的 140 例价格违法案件涉及多个方面, 但房地产价格及物业管理收费、药品及医疗服务价格、教育收费、交通运输价格、水价是价格违法相对较多的领域, 五方面占了价格违法案件总数的 62.86%。

2008 年全市共受理房地产价格及物业收费的举报投诉 26 件, 占立案总数的 18.6%, 虽与上一年在数量上持平, 但在 2008 年立案查处的案件中居第一位。房地产价格违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个别房地产开发公司不严格执行价格政策, 超规定价格销售阁楼和车库, 多收价款。2008 年, 全市立案查处药品价格及医疗服务收费违法案件仅 23 例, 虽占立案查处总案例的 16.4%, 但与 2007 年度数量相比下降了 44%, 说明这个多年以来的价格热点问题有了明显的“降温”。

随着近几年对教育收费的治理, 教育收费环境逐年好转, 教育乱收费呈逐年下降趋势, 但相对其他行业仍是一个价格投诉热点。2008 年全市共查处教育乱收费 20 件, 较 2007 年的 31 件下降了 35.5%, 较 2006 年的 45 件下降了 55.6%, 但仍占立案查处总数的 14.3%, 由 2006 年的首位退居到 2008 年的第三位。

——摘自《新华日报》

焦点关注

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干部存在四大问题

《求是》2009 年第 1 期刊登了胡锦涛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文稿。他指出, 领导干部中存在四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一是一些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还不高, 对科学发展观理解还不够深入。有的对科学发展观学习不够扎实、领会不够全面, 存在一些片面理解和模糊认识; 有的在发展观

念上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当前轻长远、见物不见人，甚至制造虚假政绩等问题。

二是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能力素质与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还不适应。有的思想不够解放，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因循守旧，封闭保守；有的缺乏推动科学发展必备的知识，缺乏进行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的能力；有的发展思路不清、信心不足；有的在关心群众疾苦、解决民生问题方面作风飘浮、工作不实，存在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敷衍塞责等问题。

三是一些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突出，粗放型发展方式尚未明显转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安全事故频发，甚至存在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增长的现象，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不强。

四是保障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做得不够，工作的系统性和协调性不强，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尚不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监督体系不完善。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我们就无法应对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新挑战，就难以肩负起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崇高使命。

——摘自《求是》

百姓日子就是政府形象

《解放日报》在解放论坛刊登汪长纬的评论说，政府是有形象的，每一级政府也都应当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但什么才是政府的真正形象，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清楚。有的官员不量民力一味追求巍峨雄伟的标志性建筑，认为这就是政府的形象；有的脱离群众不切实际地攀比办公大楼的豪华瑰丽，认为这也是政府的形象；有的甚至不惜重金为自己造势，认为这更是政府形象，其实都大错特错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都不是政府的好形象。那么，政府真正的形象是什么？就是普通百姓的寻常日子。百姓日子好比一个温度计，它能准确地测量出政府对民生的关切程度；百姓日子好似一面镜子，它能生动地映照民众在政府心中的地位。可以这样说，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政府就是一个什么形象。这里，装不得真，掺不了假。

当前，世界金融海啸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正一步步显现出来，许多中小企业遭遇生产萎缩、资金链紧张的困难，而许多职工也不得不面临着减薪、裁员的威胁。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困难对普通百姓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冲击更为明显，影响更为显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更应该

时时刻刻把群众生活放在心上。最近一个时期，不论是中央出台十项决策用 4 万亿资金拉动内需，还是地方推出各项举措加大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都把确保民生继续得到改善，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眼下，各级政府应当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民生问题，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舒坦，越滋润，越红火，越富足，政府的形象也就越光彩，越亲切，越崇高。

——摘自《解放日报》

民生工程要忌“实功虚做”

《辽宁日报》近日刊登张小龙的文章说，南方某县在总结工作时，把民生改善当作最大亮点。县领导在讲话中说：“无核荔枝是我们的名牌产品，对增加农民收入贡献很大，我听说现在市场价格是每斤 28 元，我们要加大品牌支持力度，把价格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奇怪——台下没有鼓掌声，而是嗡嗡的议论。原来，该县产的无核荔枝每斤市价不到 20 元，农民和厂家都在亏本维持。县领导关注市场价格值得赞许，遗憾的是他掌握的数据失真了。

随着各项民生实事的实施，老百姓的生活的确得到很大改善。但如果没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民生工程就会变味，就会走样，闹出如那位县领导一样的“黑色幽默”。

文章指出，民生工程要忌“实功虚做”。老百姓反映上来的问题，大多是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往往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不经过认真调研，不花费一番气力，是很难办好的。少数领导干部只抓“宏观”，不屑“微观”；只求结果，不问过程。不经过调查研究就仓促决策，开几个会议就当部署，然后坐等年终“收成”。

这样工作，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却是“抓空”，轻则流于形式，重则劳民伤财。领导干部只有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其言行才能经得起颠扑和考验，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摘自《辽宁日报》

形式主义最能应付官僚主义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在日前召开的西安市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座谈会

上说，近期，西安市相继开工了一批关系民生、关系西安长远发展的大项目、好项目。抓好这些项目建设，必须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防止各种各样的“假开工”。

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西安市建设的一座污水处理厂，开工后，有关部门多次汇报都说项目进展顺利，还专门拿来工程效果图给我看，讲得头头是道。我也信以为真。后来，我到实地查看，几个月过去了，根本就没有动，连个坑都没有挖。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典型的弄虚作假。就是这种恶劣的作风，导致我们许多好的政策、思路、措施走了形、落了空，不仅贻误了工作，而且败坏了风气。这告诫我们：形式主义最能应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最容易被形式主义所蒙蔽。对此，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引以为戒，反躬自问。

大量事实证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推进科学发展的一大祸害。实际工作中，之所以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猖獗，与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有直接关系。官僚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就会盛行，就会出现“假开工”、“假落实”、“假汇报”之类的问题。要杜绝形式主义，必须首先破除官僚主义，到实地、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

——摘自《人民日报》

“以民为先”为什么排在十个新观念之首

由人民网等8家媒体和中共中央党校等十余家科研及党政单位合作，历时4个多月进行的“当前领导干部应当树立的十个新观念”大型社会调查成果发布。依次是1、以人为本，以民为先；2、科学发展，构建和谐；3、终身学习，与时俱进；4、克服政府包办一切，发挥民间主体作用；5、根除人治，树立法治；6、尊重个性，宽容自由，兼收并蓄；7、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8、人才是第一资源；9、当官要经得起考查，财产要经得起晾晒；10、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文章分析指出，目前，官本位仍然是干扰社会进步的障碍。在个别地方和部门，干部官本位意识仍有一定的市场，有的无视民间疾苦；有的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自己权力寻租的资本；有的跑官要官，意在谋求特权；有的高高在上，听不得群众意见，或是左耳进右耳出；有的干脆以权行腐，贪赃枉法……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都可归之为“官本位”之祸也！

北京大学教授夏学銮认为，“以人为本，以民为先”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灵魂。以人为本是以人为先的基础，以民先是以人为本的表现。以人为本在逻辑上必然表现为以民为先。

所以现在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先”，是新时代挑战“官本位”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形态。一旦这种社会思潮变成一种社会情操，中国人的素质就会大大提高一步，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就会取得治本的功效，中国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就会更加和谐。

——摘自《人民论坛》

让干部专心谋事而不分心谋人

《瞭望》新闻周刊 2008 年第 52 期刊登沈小平的文章说，针对少数干部思想品质不纯，一有“风吹草动”就“上蹿下跳”、“跑官要官”的现象，一位负责同志最近强调，绝不能让只会干事、不会来事的人吃亏，绝不能让投机钻营的人得利，真正让干部专心谋事而不分心谋人。话语虽朴素平实，却道出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对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一个地区的发展，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不是说大话说出来的，必须通过干部群众辛勤劳动，一件事一件事地干，一点一滴积累。“用得善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对干部队伍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目前，在干部队伍中也存在一些思想品质不纯的投机钻营者。他们不讲党性、不重品行、不作表率，为了个人私利和宦途升迁捞本、做虚功、拉关系、搞奉迎，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造势”和“谋官”上。这些投机钻营的人在干部队伍中多了，不仅于事业发展无利，而且会严重涣散党的干部队伍，对党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如果让这些投机钻营者得利，伤害的是老实正派、埋头苦干、廉洁奉公、开拓进取的干部。

让干部专心谋事而不分心谋人，首要的是要让专心谋事的人有干事创业的平台。使他们在干事的过程中受到锻炼，经受考验，增长才干，崭露头角。让干部专心谋事而不分心谋人，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选人用人的眼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在艰苦环境和岗位上做出政绩的干部。

让干部专心谋事而不分心谋人，根本在于形成科学的用人机制。在干部队伍中形成老实人受尊敬、受重用的良好氛围。

——摘自《瞭望》

打击“山寨官员”

应先管“正版官员”

据1月5日《洛阳日报》报道，河南洛阳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日前发出通告，严厉打击以市领导或领导亲属名义进行所谓招商引资、介绍工程、找基层办事，甚至伪造领导批示进行招摇撞骗。

罗瑞明在1月7日《工人日报》撰文说，上述通告，不失为一种必要的提醒。但要防止领导被假冒，关键还在于更多的领导要约束好自己，别给骗子“示范”。也就是说，打击“山寨官员”要从“正版官员”身上下功夫。

大凡假冒领导者，都得懂一定的官场规矩，了解被假冒领导的基本情况。如果某个领导廉洁自律，从不打招呼，从不批条子，对手下及亲属要求非常严格，假冒此类领导的行骗者十有八九难得逞。如果某领导平常喜欢为亲朋好友的事“操劳”，常常向下说“事”、揽“事”，那么被人假冒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识别假冒领导，说起来并不难，只要向假冒者多问几个问题，或给领导去个电话，就能弄清楚事实原委。怕就怕真的是领导写条子、打电话和推荐过来的人。遇到此类情况，事情就棘手了。弄不好，得罪了领导咋办？假冒领导招摇撞骗者一旦被发现，将其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就是了，可是遇到真的以领导身份出面的人，有多少人会举报？有谁敢把其交到监督部门去处理？

——摘自《报刊文摘》

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

不宜简单说社会公平程度下降

胡联合、胡鞍钢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为理由，宣称我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社会公平程度下降了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其中有一部分是打破“吃大锅饭”这种不公平的平均主义后因人们在劳动工作中的贡献有大有小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这部分差距是合理，目前不存在什么问题；另有一部分是因不合理但合法的制度安排（如垄断行业工资一般偏高）形成的差距，这部分差距不合理，需要采取制度改革来依法进行调整；还

有一部分是不合法的原因形成的差距（如贪污受贿），这需要加大对非法活动的打击来取缔。因此，对收入与财富差距不能简单地一概说不公平，只能说其中部分不公平。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自主追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个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大都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对收入与财富差距的不公平要引起高度重视，但不宜不加分析地说公平度下降了。

——摘自《中国改革报》

潜规则盛行将危害社会文化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建宁近日刊文说，所谓“潜规则”，是拿不上台面，只能悄悄做，不能公开说，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和行为方式。但为什么如今潜规则却能摇身一变，成为似乎人所共知的“显规则”？不少人对此很是反感，为何却也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商场有商场的潜规则，体育界有体育界的潜规则，文艺界有文艺界的潜规则……比如说钱权交易、跑官要官、买卖书号；比如说好处费、封口费、版面费……对于这些潜规则，人们最初是坚决排斥的，但渐渐地随波逐流，再就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最后竟然是运用自如。

文章认为，如果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却是道德失范、社会失信、人文精神失落，是“聪明人”得利、“老实人”吃亏，那么，人们的幸福指数就会减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与和谐，经济发展也不可能持久。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充满法治和公平正义的精神，具有崇高的人文追求；如果一个老老实实做事、有气节有操守的人能够“有付出必有回报”，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进入高效良性轨道。

文章指出，潜规则的盛行，是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时间长了，它会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决不能掉以轻心。如果潜规则成为常态，成为人们比较普遍的行为方式和生活哲学，这个社会的文化将是危险的。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繁荣，而且是文化繁荣。我们不仅要做强经济大国，还要做文化大国、道德大国、诚信大国。只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真正实现。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潜规则必在扫除之列，我们不妨从这一步开始做起。

——摘自《人民日报》

刺激消费不等于鼓励浪费

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日前刊文说，政府倡导积极消费与国家共度时艰。但是必须强调，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并不等于鼓励浪费。像政府给与补贴，鼓励农民购买农机具、耐用消费品；给低收入者补贴，保证他们的基本需求；增加社会保障房屋供应等等，就是正确之举。但也有误解认为，政府拉动消费，就是鼓励大家多花钱，猛花钱，“弃旧图新”。简单地说，就是多吃些、多用些、多买些、甚至多丢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一些机构也借机组织各种“拉动消费”的集体活动，猛花钱。比如，北京的各个“会议中心”、“温泉中心”里，就一下子热闹非凡，商家也是趁机大捞一把。一张温泉中心的消费券竟然价值四五百元，一份包装精美的春节礼品盒可高达上千元。

文章认为，拉动这样的“新消费”是一种误导，如果这样下去，必然会产生不良后果，造成严重的不必要浪费。我国人口多，不适当的消费，必然导致对资源、能源、粮食等的不合理需求。

文章说，中国有提倡节俭的传统美德，节俭就是不浪费，就是适度；节俭不是不消费，而是不过度消费，不超能力消费。也就是说，消费要与需要相符合，也要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相匹配。至于政府机构，其经费来自纳税人的贡献，是公共资产，更要节俭才是。在危机情况下，适度扩张信用，增大社会开支是必要的，但机构公共开支应该从紧，提倡过紧日子，这与拉动内需并不矛盾。

——摘自《人民政协报》

挤“爆棚”的不全是知音

博物馆“免费文化大餐”遭遇考验

有关信息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有1000多家博物馆实现了“免费开放”。然而从目前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情况看，观众的“井喷”、“爆棚”，以及各种不文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博物馆、纪念馆文物的妥善保护。

作为较早对外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在免费开放之初，每日被闻讯而来的上万名观众挤得险些“爆棚”。因为长时间排队，一些观众情绪躁动，互相推挤，甚至引发肢体冲突；馆内厕所人满为患，地上痕迹斑斑……

2008年4月，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免费开放，因不堪一些参观者触摸油画展品之“苦”，最终不得不以复制品替代油画真品展出。馆方表示，这是无奈之举。

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沈海宁说，博物馆免费开放是好事，但对普通大众来说，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顿“免费的午餐”，而是一场“文化的盛宴”。这需要博物馆方面开动脑筋，不断开拓展示内容，不断更新服务方式，并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

——摘自《新华网》



辽宁阜新“大接访”活动的可贵实践

民生“旧账” 谁当官都应埋单

《半月谈内部版》第1期刊登记者专稿说，2007年6月起，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立了县委书记“大接访”制度。县委书记王宏伟一年多来持续参加“大接访”活动。他说，“近年来处理信访案件，我感到‘新官不理旧账’是产生信访难点的重要原因。乡镇、村的班子三五年一换，过去的事我不管，新发生的事我负责，这就算好干部了。对过去班子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涉及面广的棘手问题，大家都躲着走，使很多信访案件久拖不决，最终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信访案件。”

王宏伟向记者谈到了一起“新官不理旧账”的典型案列。10年前，山东省一位老汉卖给平安地镇价值10万元的扁杏苗，这些扁杏苗运到本地后在冬储时，镇里没有照顾好，第二年开春种植后都死了。镇里拒绝支付扁杏苗的费用。县法院判这位老汉胜诉但无法执行。于是，他多次从山东到阜新上访无效，转而多次进京上访。后到任的干部说，这件事时间太长了，解决不了。王宏伟说，这件事的责任完全在镇里。无论谁当镇长，老汉的问题都要解决！2008年，镇政府支付10万元给这位老汉。镇里财政困难，先由县财政垫付，再从镇政府经费中分两年扣除。

“新官必须理旧账！”王宏伟介绍说。现在，县里已将“新官理旧账”全面纳入领导干部考核，对“不理旧账”的干部在组织考察时“一票否决”。同时，进一步强化干部的离任审计，绝不提拔那些遗留问题多、矛盾多、农村稳定工作处理得不好的干部。

《半月谈内部版》为此刊登短评说，将“新官理旧账”全面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让那些对“旧

政”中的民生问题百般推诿的干部“下”，让真正善于处理矛盾凸显期复杂利益关系的干部“上”，这正是阜新“大接访”活动取得的最可贵成果。

——摘自《半月谈内部版》

广吸人才 增强文化产业“软实力”

扩大内需离不开扩大“文化内需”，也离不开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产业的“软实力”。而增强文化产业“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注重文化人才的培养和汇集更多高端文化人才。在这方面，杭州市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全国各地都在呼唤增强文化“软实力”之时，很多重要艺术家、创作者正在向杭州汇集。《人民日报》曾以《西湖边长出了许多“文化大树”》为题报道了这一现象。

“杭州女婿”韩美林曾不止一次表示，后半辈子愿在杭州度过，杭州植物园、西湖湖畔，先后为这位艺术家兴建了韩美林艺术馆、天书楼，艺术家本人捐出超过 3000 件艺术作品；喜爱杭州、书写杭州的余秋雨、陈祖芬，和韩美林一起，欣然接受了“西湖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出生于杭州、成名于北京的浙籍作家余华，也在 2005 年“回归”杭州，成为杭州市文联一名专业作家；尚未完工的西溪文化创意园，有意向在那里开工作室的文化名人，可以排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刘恒、邹静之、赖声川、杨澜等。2008 年 10 月，正式调到杭州市文联的作家麦家，是又一位向杭州汇集的“重量级”文化人物。

杭州不仅重视已成名的文化大家，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文艺人才，也千方百计地网罗进来。为了能成为吸引文化名人、艺术人才的“文化高地”，杭州采取“一人一策”办法，涉及户籍、编制、职称、住房、子女就学等问题，都有相应的解决之道。一项“青年文艺家发现计划”，将目标定为“经过 3 年至 5 年努力”，力求使杭州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组建一支杭州青年文艺家“军团”。没有高学历、曾经“漂”在上海的青年编剧余青峰，2006 年被“不拘一格”引进杭州。成为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编剧后，他在杭州的首部作品越剧《李清照》，摘得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锡剧《江南雨》获中国戏剧节剧目大奖。最近到上海参加国际艺术节，演出具有轰动效应的越歌剧《简·爱》，也出自余青峰手笔。

西湖边长出了许多“文化大树”，又离不开经济上的“施肥”。杭州一次就拿出 100 多套市中心的住房，分配给宣传文化系统，除西溪湿地附近的西溪文化创意园将建 50 套“名人名居”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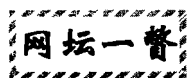
别墅外，余杭、萧山白马湖等地还会有 150 套房子，专门为国际国内著名作家、艺术家、创意家提供创作、交流、休憩的场所。杭州为麦家等文化名人、文艺人才提供的条件，确实一直不乏“大手笔”，一系列政策的“含金量”国内少有。为麦家到来解除后顾之忧的最实在举措，是为他备下一套 130 多平方米的房子。这套位于市中心、运河畔，位置绝佳的住房，因属经济适用房，麦家作为引进人才可享受的住房补贴，差不多可支付购房费用。士为知己者用，消除了后顾之忧，他们便能尽心竭力地为浙江服务。杭州市的这些大动作，是有远见卓识之举。

在这方面，上海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不断推广和创新。1987 年，上海京剧院引进陕西省京剧团名誉团长尚长荣，推进了整个京剧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尚长荣加盟上海京剧院 21 年，接连主演了 3 台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及《廉吏于成龙》。每一台戏都获得了成功，都成为新编历史京剧的界碑式的作品，也使尚长荣先生下半生的艺术成就高潮迭起，大放异彩。尚长荣的名字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京剧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文化部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从 1999 年到 2008 年已办了 10 年。这 10 年，是吸引全世界艺术家来上海献艺的 10 年。五大洲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3 万余名艺术家、300 余个中外艺术团体造访艺术节，共上演中外剧（节）目 606 台，300 余万名观众走进剧场观看演出。上海是个“海”，有海纳百川的优良传统，如果能吸引更多的高端艺术人才，必将在增强文化产业的“软实力”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增强文化产业的“软实力”，还应尊重艺术创作的独特规律。发展文化产业，既要增加相应的经济投入，又要避免太过功利的考量。引进高端艺术人才，既要积极，又要慎重。不应图虚名，而要见实效。既要引进大量的人才，又要用好现有的人才。总而言之，发展文化产业不能急功近利，要细思量，徐图之，有规划，抓落实，这样才能使发展的文化产业在新形势下更上一层楼。

——摘自《中国文化报》



下一步改革路应迈向“新的开放”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如何纪念这 30 年？最富有意义的事情，是考虑如何进行今后 30 年或者更长历史时期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而取得；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

的问题也必须经由继续的改革开放而得到解决。除了不间断的改革开放，中国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可以途径。

之前经济改革出了什么问题？

在过去的 30 年，改革开放是由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过程组成，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但实际上也可以把对内改革理解为内部开放。正是因为是内部开放，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

从内部开放的角度，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目前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也可以理解如何去寻找新的改革动力——一切有关乎利益。

但改革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外部开放，已经培养了方方面面的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同时他们本身变成了新的既得利益，成为了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阻力。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从事的方方面面的垄断。

上世纪 90 年代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有 2 个。一是重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走向了反面。

中国国企的规模的确越来越大，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当国际竞争力缺失的时候，很多企业转向了国内。这就造成了垄断。垄断就是“大鱼吃小鱼”，侵吞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各种垄断机制往往导致国家的财富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

垄断既是中国特有的收入分配差异巨大的结构因素，也是中国经济难以创新的制度制约。可以说，如果政府垄断局面不能打破，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就毫无希望，就会失去进一步的发展动力。

社会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在社会改革方面，缺少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开放不足，就是说社会力量影响不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在当今发达社会，社会改革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项社会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全民教育体系，都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建立起来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现在是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各项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但事实是，社会改革的进展很不理想。

社会改革需要钱。问题并不是国家没有钱，而是因为国家所拥有的钱很难有效分配下去。从

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看，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政策的执行能力看，就不是这样了。如果不能有效地把钱用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那么就是失败。

如何克服阻力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显然，政治改革是关键。而政治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治过程的开放。中国并不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但大都是体制内的改革。这些年来诸多体制内改革效果往往是左手改革右手，没有任何力度。

中国需要靠什么来改革？靠解放思想，靠政治创新。思想解放和政治创新首先就是要解决谁来改革的问题。就是说，改革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执政党。但执政党如何能够获得改革的动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改革的主体呢？只能通过执政党吸纳社会力量来达成。

改革亟需迈向“新的开放”

政治向社会开放至少有 2 层意义。一是执政党向社会吸引官员。中国政治制度不学西方，但这并不是说不能向社会吸取改革者。新加坡是个很成功的例子。新加坡的大部分高级官员甚至是领导人都是由社会培养的。他们进入执政党之前都是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精英。从社会吸纳人才有效地解决了执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的问题。

与之相比，中共都是从内部培养干部，培养的往往是官僚类型官员，缺少全局观与社会观，自然也很容易与人民和社会脱节。

二是向社会分权。中国的分权总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进行，也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总是在政府内部进行。向社会分权就是要向社会寻找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要产生改革的动力，权力在向中央集中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分权。

当改革开放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抱怨改革开放，否定改革开放，都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改革和开放。而新的改革开放也不是简单地对从前的重复，新的开放必须是向社会的开放。不管阻力有多大，开放政治是中国必须追求的目标。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张甫雄 责任编辑：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镇江市解放路 17 号

电话：84447365 邮编：212001

E-mail: zjtsgbk@126.com